

酸、甜、苦、辣

吳鑄人回憶錄

(一) (本文插圖刊第6、7、42頁)

● 吳鑄人原著 · 王成聖校訂

北大生物系的學生

我的父親是一位道地的民主政黨老黨人中國革命同盟會會員。我們從孩提時代，即常聽父親講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動人故事；包括他那偉大的人格，崇高的理想，為國為民的犧牲奮鬥精神，可歌可泣的英勇革命事蹟，以及創說三民主義，制定五權憲法，以求實現中國之自由平等。因此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烙下了一種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同時也播下了一顆愛國救民的革命種子。

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交戰，我正在蕪湖省立第五中學讀書。當時教務主任兼國文教師高語罕先生，還是國民黨黨員（後來轉變加入共產黨），有一次上國文課時，高先生徵詢大家意見：「你們贊成直系勝利呢？還是贊成奉系打勝呢？」班上所有的同學都贊成直系戰勝，因為吳佩孚在當時還薄有虛名，而張作霖大家全說他是驕匪，是馬賊。如果奉系得勝，豈不要天下大亂？唯獨我表示反對。高先生覺得奇怪，就叫我站起來講原因。我說：「如果直系勝了，孫中山先生的革

命，還要遲幾年才能成功，如果奉系勝了，中山先生的革命很快就成功。環顧今天的混亂局面，沒有一個軍閥能够成事，只有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才有希望把中國徹底治好。」高先生聽完頗為動容的說：「很有見解，我投你一票。」我覺得很受鼓勵，非常開心。

當我在中學求學的時代，長久以來心裏總有一個想法。我認為我們中國積弱的最大原因，就是科技落後，物質文明遠不及西方的進步。所以我立志以科學救國，並無從事政治，參加革命的念頭。因此在學校裏對於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特別認真。尤其重視英、數兩科，因為英文是研讀西方學術書籍的必要工具，數學是研究一切科學的重要基礎。我考入北京大學以後就進了理預科。理預科是很嚴格很難讀的。北大那期總共招了二百多人，進理預科的也不過八十多人。理預科當時分甲、乙兩組。我在乙組。考試很難，每年全有很多人補考。我的成績還不錯，從來沒有補考過。我的兒子有一天看到我就讀北大生物系時考試的成績單他帶着欽佩的口吻說：

「爸爸，您在北大的成績真不錯，每門功課都在八十以上！」我想，若不是參加革命，今天自己多半是個科學家，縱不是科學家，也會是一個農業專家或醫藥專家。因為我是生物物的，在校一直從事農、醫方面的實驗。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我在北大生物系讀書的時候，校長是蔡元培先生，他曾是北大植物學教授鍾觀光的學生，我可以說和蔡元培先生是同行，蔡元培辦北京大學的原則是「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見蔡元培自寫年譜），因此聘請具有許多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到校任教，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後任北大校長）、錢玄同、劉半農和魯迅、夏元瑛等均是。我們的系主任是譚熙鴻（仲遠）先生，教授是李石曾先生，他們都是追隨中山先生的黨國元老。講師是褚民誼先生（褚先生後來是汪精衛的

擁護者之一)。最重要的是植物學的教授鍾觀光(憲鬯)先生(蔡元培先生曾從鍾先生學過生物學)，和動物學及生理學的教授經利彬(燧初)先生。經先生是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問道德都令我衷心敬佩。

北大的一貫傳統是：只要有一人求學，就開班施教。最初生物系只有我一個人讀，學校照常開課。後來我又拉了一個同學來。這位同學本來要進化學系的，我覺得只有我一個人讀生物系，實在太無聊了，於是就拉這位張鳳瀛同學來作個伴。所以我們系裏就有兩個人了。一班兩個人，先生上課就等於家庭教師為學生補習一樣。名師真傳之外，加上學校先進的設備及實驗室，功課自然進步得很快。我既然已立志從事科學救國，為什麼又走到政治革命的路上來了呢？這完全是一次偶發的事件所引起的。

民國十三年初春，有一次我們做實驗，解剖一隻狗，把牠的胃拿掉，但仍供給牠營養，觀察記錄牠能維持多久的生命。結果沒多久狗就死了。我就問管理實驗室的校工：「狗怎麼死了？」他說：「因為我們學校好多天沒錢買煤，煤店沒送煤來，所以就將狗給凍死了。」我聽了之後，火冒千丈，大發脾氣的吼起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種混帳政府還能在嗎？連學校的煤都供應不起，還講什麼科學救國！」大怒之下立刻跑去和北大東齋同寢室的謝汝鎮同學講：「我要入國民黨參加革命！」謝汝鎮當時是國民黨「孫文主義學會」的會員。我那時對什麼「國民黨」、「孫文主義學會」還是莫名其妙。他說：

「我帶你去見陳兆彬先生。」當時陳是大大中學的校長，而大中中學是國民黨在北平的秘密機關之一。陳是廣東人，也是北大校友。他帶我去看丁惟汾先生。丁先生講話慢吞吞的：「你——爲什麼——要——入——國——民——黨——呢？」我告訴他：「我本來打算從事科學救國，前兩天做實驗，學校沒錢買煤，把用作實驗的狗給凍死了。我想政治革命不能成功，科學救國乃是幻想。所以我現在要投入國民黨，參加革命的行列。」丁先生拿了一份表格給我填，又送我一部「三民主義」。於是我就加入了國民黨，而丁惟汾和陳兆彬兩位先生是我入黨的介紹人。

我加入國民黨後相當活躍，經常肆無忌憚的在北大公開說：「我們做青年運動，一定要吸收學校裏品學兼優，有血性，有幹勁的好學生。」在北大有許多同學和我私交很好，關係密切；有的我已經把他們介紹入黨，有的我正多方設法，把他們列入爭取入黨的對象。漸漸的我們這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們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中山主義實踐社」。「中山主義實踐社」的成員，到台灣來的，有李超英、李壽雍、許孝炎、伍家有幾位，都是北大同學，和我屬於同一個小組織。爲什麼叫「中山主義實踐社」呢？就是要有別於馬克斯、列寧的共產主義。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除了舉辦各種有聲有色的活動外，又創辦了一個頗獲好評的實踐旬刊。這個雜誌由吳稚暉先生贊助，並親撰發刊詞，對同學們多所勉勵。

再談一件我入黨之初的趣事：那時我可說完

全不了解作一個國民黨員的危險利害，在言行上可說是幼稚到了極點。其中李壽雍比我較早入黨，因此懂得的東西比我稍多一點。有一次我用電話召集同志們開會，他就警告我說：「唉！你怎麼這麼大意！電話會有人偷聽的，你用電話找大家開會，將來偵緝隊會把我們統統都抓去的呀！」這下我才知道電話的不可靠。此後才慢慢的體會到從事黨務工作的危險性，從而逐漸小心謹慎起來。人生的際遇變化，往往是難以逆料捉摸的。我原來立志從事科學救國，沒想到在北大讀書的時候，由於一次偶發事件，使我對北洋政府的頹頹腐敗感到極度的憤慨，因而引發了埋藏多年的革命種子，年輕氣盛，大怒之下，一變初衷，改投國民黨參加革命，從此與黨政工作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

北伐統一奠定基礎

民國十三年冬，段祺瑞電邀國父北上共商國是。成立所謂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角同盟。國父抵津後堅決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實行民主，希望經由政治的途徑，採取和平的方法，以求國家的統一，從而建立一個民有、民治及民享的新中國。段祺瑞起初未表異議，登上臨時執政的寶座後却堅持召開「善後會議」，而且毫不讓步。於是孫中山訓令所有國民黨同志，不准參加段祺瑞所把持的「善後會議」。當然段祺瑞也施展出種種手段來麻醉分化我們國民黨，爭取許多當時有力人士參加，例如北大的顧孟餘教授，胡適之教授，均在被邀

之列。胡適之報國心切，抱着嘗試的心理，未及深思，就答應參加了。顧孟餘遵照孫中山總理的訓令斷然拒絕，並且在京報上登了一則啟事，大意是說：「最近新聞記者問我有沒有接到執政府邀請參加善後會議的公函？可能他們發過邀請我的公函，但我沒有注意到，或許我不經意的把它扔到字紙簍裏去了。縱然我看到這件公函，我也不會睜着眼睛跳進這個豬圈裏去。」胡適之看到這則啟事之後頗為不悅的說：「孟餘罵我是豬啊？！孟餘罵我是豬啊？！」胡適之與顧孟餘本是好友，因為這次參加與不參加善後會議彼此發生隔閡。顧孟餘先生來台後，我有一次在周德偉先生家陪他老人家和顧夫人吃飯，提及許多過去的人事，他都不答，或說忘記了，唯獨當我問到他在北京京報上登載前面所說那則啟事的事時，他連忙答說：「我記得！我記得！」

孫中山先生一到北京，肝癌病發，不久即住進協和醫院。雖經全力救治，終因積勞憂憤，而回天之術。肝癌到了末期病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孫中山對其本身肉體上的病痛全不放在心上。自始至終一心一意念念不忘的，只是國家的前途，和如何解除同胞的苦難。臨終彌留之際，猶自斷斷續續的勉勵同志們說：「和平！奮鬥！救中國！」這種崇高的精神和偉大的人格，真是集古今聖賢豪傑於一身。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到北大。我在東齋寢室痛哭失聲。想到自幼崇拜的精神偶像民族救星忽然殞滅，不由得悲從中來。

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出殯之前，靈柩停在

中央公園（後來改稱中山公園）一星期，讓民眾前往瞻仰致敬。前去致敬的約有一百萬人。出殯時的行列，最前面是盛大的儀仗樂隊。其次是花圈隊，由北大學生組成，人數約有一千，隊長是故立法委員延國符先生，我也是花圈隊中的一員。為什麼叫延國符先生當隊長呢？因為他在同學中人高馬大，所以凡有什麼重要遊行活動，總請他來扛大旗領隊，最為引人注目。扶靈抬棺的都是黨國名士，如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張繼、鄒魯、丁惟汾、顧孟餘諸先生。萬人執紼，數十萬人夾道致哀。哭聲震野，氣氛極其肅穆悲痛。全體恭送孫中山先生靈柩出北京西直門，暫厝在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總理在北京逝世，對於以後北伐的成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北京是中國歷代的首都，在此之前，北方民眾不十分了解孫中山是何許人、國民黨是個什麼樣的政黨，自從孫中山總理逝世停靈于中央公園一週，供各界瞻仰遺容，每天從早到晚，前往祭拜的羣衆成千上萬，人潮絡繹不絕。在宣傳上發生了無與倫比的效果，真能達到孫總理所謂「震醒國魂，喚起民衆」的目的。無數的人因而認識了國民黨，進而參加了革命運動的行列。所以孫中山總理在北京去世，對爾後的北伐，產生了極大的助力，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朱家驊策劃首都革命

孫中山總理逝世以後，因為段祺瑞不遵循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程序，一意孤行，所以在十四年年底，我們國民黨設在北大翠花胡同的黨部，就

發動了一次「首都革命」。

首都革命由我們北大地質系名教授朱家驊（昭先）先生所策劃領導。朱家驊先生也是我的授業恩師之一。因為我在北大預科讀書時，他曾教過我地質學概論。當年朱先生手下有幾員重要幹部。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來台的還有一位張經同學，貴州人，以後改名叫張定華，曾任監察委員，去世已經十幾年了。這位張老弟比我小兩歲，短小精悍，勇猛異常，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

朱家驊先生年輕時儀表出衆，非常英俊。首都革命當天，他身穿一件皮夾克，腳穿一雙大馬靴，肩扛大旗，精神十足的率隊前進，溫文俊秀之中，透露出堅毅果敢的英氣。我們在北上門集合。北上門也就是故宮博物院的後門，可以上登煤山——明末崇禎皇帝自縊殉國的地方。

大隊人馬到齊之後，朱先生即對大家演講，痛責段祺瑞執政府的種種腐敗和暴行，謂不推翻段祺瑞，無以解天下蒼生之厄。朱家驊先生的演說慷慨激昂，撼人心魄。

講畢羣情激動。於是乎左邊一個吳壽金（這是當年我在北大讀書時所用的名字，就是把原名吳鑄人的鑄字拆開來用），右邊一個張定華，分率兩隊。北大部份同學及實踐社成員由我當領隊，其他人等由張定華領隊。兩隊一共有兩千多人，主要份子是大同同學，其餘還有女師大、清華、燕大等校學生，此外也有很多愛國民眾參與。

此時人人磨拳擦掌，義憤填膺，一鼓作氣，直奔吉兆胡同，把段祺瑞的官邸包圍了個水洩不通。大夥爬上官邸牆頭，一面向裏面扔石頭，一

面大喊：「打倒段祺瑞！打倒段祺瑞！」叫得震天動地。段祺瑞當然非常生氣。他想自己身為國家元首，學生們居然敢發生暴動，把自己住宅包圍了，把房子砸得七零八落，還大喊打倒段祺瑞！這不是造反了嗎？不過這次他還算隱忍住了，沒叫衛隊開槍打我們。

大家示威大鬧了一陣，天黑才解散返校。這是民國十四年年底的首都革命。朱家驊先生年輕時是個了不起的少壯派領袖。我們同學當時全很欽佩他。以他當時的身分地位，做北大教授每月拿三百元大洋的高薪，原可在家過太平逍遙的日子，只爲了盡知識份子對國家的一份責任和良心，竟不惜身家性命，領導學生革命。這種精神和氣概，怎能不令學生們敬佩！這次行動給段祺瑞打擊不小。雖然這次沒有發生流血衝突，却爲後來的「三一八慘案」種下了不幸的前因。

奪下警察士氣威風

自從晚清政府以關稅收入作担保借了大筆外債以後，我國的關稅即由外國人掌管。還本付息之後所剩之結餘，稱爲「關餘」，依協定應交中國政府。依此協定，孫中山在廣州命英國人把廣州關的「關餘」送交廣東大元帥府。英國人不肯，孫中山先生堅持其交出。英國人一怒之下派兵艦來示威。孫中山先生下令虎門砲台開砲轟擊英國兵艦。砲台司令向孫先生報告說：「我們砲台上的砲，口徑比英國兵艦上的小。我們打不到他們的砲，他們的艦砲卻能打到我們砲台！」孫先生說：「我不是真要你打沉英國兵艦，我是要你把革命

的氣勢打出去，把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精神打出去！」孫中山先生威武不屈的性格與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由此可見。

段祺瑞主張召開關稅會議，提高關稅稅率，使外債得以早日清償，同時執政府也可因此獲得更多的關餘，以解除自身財政困難。但是如此一來，必然會加重百姓的負擔。這種不顧同胞生計，只圖肥己利外的企圖，國民黨人自然要堅決反對。在國民黨的策動下，北京的熱血青年就展開了一次「反對關稅會議」的示威遊行。

示威當天，北大同學從北大西齋出發，經府右街，至新華門集合。師大學生從琉璃廠出發，也是在新華門會合。預計所有同學到齊之後，就一同向執政府前進。

東城以北大同學爲首的隊伍，進行到府右街和西長安街交道口時，被警察堵住了。我們北大最高的掌旗同學，就是前面所說的山東大漢延國符先生，由於在隊伍最前方，首先就和警察動起武來。延先生拿着大旗直舞，左衝右突。但始終衝不過去。警察都有指揮刀，我們赤手空拳如何抵擋？不得已，只好後退。

由於我也排在隊伍最前線，當和警察衝突時，有位警察準備拔刀要來砍我，由於當時二人距離太近，心想，如果後退，必爲其砍中頭部，向前衝或可避免擊中。說時遲那時快，立刻大吼一聲，用盡生平之力，飛身一脚踹到那警察的小腹。只聽他慘叫一聲，倒在地上。我趕緊上前，把他抽出一半的指揮刀奪了過來，然後得意洋洋的揮舞着戰利品歸隊。部份同學看到這驚心動魄的

一幕，雖然在慌亂之中，仍禁不住爲我大聲喝采。

第二天當地報紙報導了這次請願遊行的事。

很詳細的描述了學生與警察衝突的細節。有的報導甚至說，奪刀事件爲改革製了勝利的空氣——奪了警察的指揮刀就等於奪了他們的威風和士氣。這一仗，我們沒有打進新華門，警察也沒抓到我們任何一個人。雙方打了個平手。但這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雖然沒把敵人打倒，却打出了革命的氣勢。這次的遊行示威，使段祺瑞再一次體會到革命形勢的重大壓力。

喫個早點逃過一劫

反對關稅會議之後，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知識青年，以血肉之軀，不斷與段祺瑞的執政府發生衝突。一方面在報紙上連續不停的發表攻擊言論，一方面只要一遇到機會就發動示威遊行和請願。因此雙方對立的形勢是越來越尖銳化了。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國十五年的三月十八日就發生了轟動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民國十五年還是國共合作時期，有一次譚平山先生（當時屬共產黨，後來又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來北京，在北大北河沿第三院報告段執政政府種種賣國的不法勾當。我們聽了之後，個個怒火中燒不勝憤慨。譚平山先生離開北大之後，大家立刻決定發動請願。於是，先在三月十五日那天，到鐵獅子胡同向段祺瑞的執政府請願。沒想到一位請願同學竟被段執政的衛隊打成重傷。這位同學是四

川人，名字我想不起來了（我的日記本原來詳細記有這事的發生以及受傷者的姓名，可惜日記在動亂中遺失）。流血事件發生之後，大家將傷者抬去就醫。這事很快即轟動北京各學校。這就是所謂的「三一五」事件，它也就是「三一八」慘案的導火線。

因有同學被打傷，我們立刻決定發動「三一八」天安門大會，舉血衣遊行，向執政府抗議。

那天參加大會的人很多，大約有兩三千人。絕大多數是北京各大學和中學的學生。此外還有工人、廣東外交代表團、留日歸國學生代表團等等。大家分成若干隊，很有秩序的進行請願遊行活動。事發的前一天，我通知許多同學於次日一早來北大西齋宿舍集合，以便準時到天安門開會。由於趕印傳單、文告，忙到差不多兩、三點才睡覺。「三一八」清晨許多同學都到我寢室來了。我實在太疲倦了，早上竟爬不起來。夢中只聽同學們叫：「老吳！老吳！」醒來頗感慚愧，趕緊翻身下床，草草擦了一把臉，喝了一杯涼開水，披上一件外衣，就匆匆跟大夥兒一同向天安門出發。平常早上起來，我總會吃一碗豆漿，外加兩個小麵包——這是當時北大一般同學的習慣早點——這天全免了。

「三一八」當天，不分黨派、學校，幾乎都到齊了。國民黨方面有顧孟餘、朱家驊等先生，共產黨方面有李大釗、徐謙（季龍）諸先生。此外還有朱自清、林語堂等名教授。學校方面包括北大、女師大、清華、燕京、朝陽等大學以及大同、大中等中學代表。可謂盛況空前。

在天安門開會的時候，由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事先推定徐謙（季龍）作主席（當時國共仍處於合作時期）。徐的演講內容不外是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殘害青年、反革命以及反民主等等的類話。會場上人人熱血沸騰，情緒激昂。開完會大隊開始遊行。浩浩蕩蕩，聲威壯盛的向鐵獅子胡同執政府所在地進軍。

我走在大隊前面，可是越走肚子越餓。北京路邊有擺挑賣大蘿蔔的。順便買了個大蘿蔔，邊走邊啃，邊散傳單喊口號。那知蘿蔔不但不能充饑，反面越吃越餓。加上兩夜沒睡好，越走越累，越喊越渴。這時已經走到西四排樓，腹中雷鳴，餓得頭昏眼花，手脚發軟，實在走不動了！於是就和前後兩位好朋友商量，如何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兩位好友前面一個叫賀楚強，湖南人，和我是北大西齋室友。賀先生來台後曾任民族晚報社長。後面一位叫莫同榮，廣東人，原來是瓊崖學會的領袖，是朝陽大學的高材生。莫先生後來死於民國十六年張作霖查抄北京俄國大使館事件。當時我向他們二位提議：「老賀！老莫！我實在餓極了！我們既在大隊最前面，可以下來先吃碗麵再追趕大隊一定還來得及。」他們說：「好！我們也都餓了。」三個人立刻離隊，跑到路邊小館子各吃了一碗麵。吃完以後，真是所謂「低頭拔草鞋，行人過山去！」連個大隊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我們趕緊各自跳上一輛洋車，從後面拼命的趕。不料忙中有錯，竟跑到吉兆胡同，段祺瑞官邸去了！衛兵見到我們就罵：「小舅子！馬上就

給你們好看！」莫先生是廣東人，脫口罵道：「丟啦媽！」我趕緊阻止說：「老莫，別罵了，我看情況不對，快另謀他途。」於是下車，付了車錢。剛走幾步就聽到密密麻麻的機關鎗聲，其中還夾雜着其他鎗的發射聲！

一聽鎗聲我立刻對他們二位說：「不好了！開鎗了！而且鎗聲這麼緊，我們的人一定傷亡慘重。我們趕緊到附近小店暫避一下。」於是我們馬上把傳單丟掉，把身上掛的標誌撕下。當我們坐進路邊小店時，就看到街上許多人沒命的狂奔，慘呼時起，其中還有不少負傷流血的。真是一幅驚心動魄，兵慌馬亂的慘相。過了不久，許多救護車也飛馳而來。一直等到街面上完全清靜了，我們才回到北大。

北大的校工看到我們平安回來，個個都非常高興。他們異口同聲對我們說：「我們以為你們這次死定了，回不來啦！」我笑着說：「現在不是回來了嗎？革命尚未成功，怎麼能死呢？放心好了。」真想不到，饑餓竟使我們逃過此難。

死傷人衆天地落淚

「三一八」那天死傷的共約三百餘人。當晚雨雪夾雜，紛紛而下，好像老天也落淚了，真是「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次日清早大雪紛飛，令人感到分外的淒涼。我們起來後就跑去認屍。當時由於我一方面是北大學生，另一方面又在大同中學任教員，所以我必須想法子把北大同學和同學生的屍體抬回來安葬。

那次死難的人中，計北大四名，女師大兩名

，大同中學一名，連同其他遇難的，共五十一具棺材排列在鐵獅子胡同口。棺材中躺着血肉模糊的志士們。觸目驚心，慘不忍睹！

我一面涕淚縱橫，一面把棺木一個個打開來辨認。我想，這種悲慘絕倫的屠殺場面，任何有理性，有良知的人看了，都會傷心落淚。連執政府廣場前的一對石獅子好像也在黯然神傷。只有那絕滅人性、喪心病狂的段祺瑞，才狠得下心，命警備總司令鹿鍾麟來做劊子手，親自在場指揮屠殺這些赤手空拳的熱血愛國青年。

此時我內心也感慨於學人生命的脆弱與無常。昨天還是生龍活虎的青年，今天竟成冰冷僵硬的屍體。一晝夜間生死的變化實在大得令人不敢相信。

這些熱血愛國青年的倒下，不僅是家族的損失，也是民族的損失；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三一八」段祺瑞惱羞成怒，下令屠殺請願羣衆以後，即通令壓制以國民黨爲首各黨派的活動，並通緝顧孟餘、李石曾、朱家驊、丁惟汾諸先生（除了丁先生外，其餘三位都是北大教授）。所以他們當晚紛紛逃去天津。但是李大劍（守常）先生沒走，因爲通緝令上沒有他的名字。他因爲有北京俄國大使館可資掩護，所以就住進俄國大使館。在國共合作的情況下，很快的，北京政治分會以及北京市黨部也隨之全搬進俄使館去辦公了。

「三一八」慘案中外喧騰，譴責紛紛而來，造成段執政府極大的困擾。種下了它敗亡的近因。

段祺瑞自直皖戰役（民國九年），被吳佩孚、曹錕打敗後，軍事上已沒有多大實力。由於馮玉祥在豐台火車站爲其舅父陸建章報仇，殺了徐樹錚，張作霖以此爲藉口向北京進軍，馮軍敗後退入綏遠成立「西北軍」，段的處境更爲孤單。

段祺瑞的執政府，本建立在孫、段、張之三角矛盾的結合上。由於孫中山堅決反對「善後會議」，鼎立之勢已失去一足；由於馮的敗走，鼎足二足，再也無法站立了。在張作霖的壓迫，和「三一八」慘案的不利影響下段乃退居天津。我們可以說，段的政治生命結束，始於不接受孫中山先生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而正式告終於「三一八」慘案。

張作霖入駐北京後，自稱安國軍大元帥，成立大元帥府。他的暴戾恣睢尤甚於段祺瑞。民怨沸騰，人心思變。這對以後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成功，有極大的幫助。

大元帥府成立以後，張作霖對於國民黨人的壓迫日甚一日，儘管如此，我們國民黨人的活動非但沒有氣餒，反而日益積極。只是在方式上，由原來的公開活動，轉變成地下活動。

這時候北方的黨務由北京政治分會委員李大劍及路友于兩位先生負責。辦公地點設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內。在「三一八」以前，我們國民黨是租的翠花胡同八號民房辦公，「三一八」以後，因顧孟餘、丁惟汾、朱家驊三位先生被通緝逃去天津，於是總部也只好暫時移到俄國大使館內的中東鐵路辦事處辦公。

張作霖進了北京不久，將所有北京國立大學（一共有八所）合併，成立國立京師大學，由劉哲任校長。北大因此改名爲北大學院，由秦汾（景陽）先生任院長。改制後規定各系學生人數凡不滿五人者科系取銷，原科系之學生必須轉其他科系就讀。生物系只有兩名學生，當然在取銷之列。當時我還沒畢業，沒辦法只好去見秦汾院長。我說：「學校把生物系取銷了，我現在沒書可讀了！」秦汾先生說：「你願意轉入那一系？」我說：「不行，我不能進別的系，只能繼續讀生物，因爲我還有一年就要畢業了。」他想了一下說：

「這樣好了，我每個月給你們這一系八百塊錢，你們不要上課，只隨教授們作研究工作，到明年你們仍以生物系學生名義畢業。」秦汾先生是北大的老教授，承他看得起，及時對我們伸出援手，真是感激莫名（北大教授們一向都很看重學生）。

得到秦汾先生的指示，我們立刻就跑去和程利彬、鍾憲鬯兩位教授商量，我說：「反正只有一年，八百塊錢就八百塊錢，大家湊合一下算了，就勞駕您們二位教授把這筆辦公費分配一下。」二位先生也同意了。

這下可好了，從此我們的生物系就變成我的大本營了。系辦公地點在第二院，既清靜又隱蔽。辦公室裏有工友，有茶水，冬天還有煤火可以取暖。

在辦公室對外交通傳遞消息全很方便。秦汾先生真是幫了我的大忙。（未完待續）